

青年的金融风险、金融能力和社会工作干预*

周晓春 邹宇春 黄 进

摘要: 青年遭遇创业骗局、大学女生遭遇“裸条”贷款、学生校园贷危害等现象引起社会关注。通过对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基于金融能力框架对这一现象给予理论解释。研究发现:在社会金融化的大背景下,青年人自身以及家庭、社会的金融素养都不足,在缺乏正规金融服务机会的同时,非正规金融服务迅猛发展,从而导致青年遭受金融风险,进而危害其健康成长。建议开展不同层次金融社会工作干预,包括出台金融能力与资产建设导向的社会政策,开展全民金融知识和能力的训练,对陷入金融风险的青年提供法律咨询和其他救助等。

关键词: 金融化 金融能力 青年发展 金融社会工作 校园贷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频发的和青年有关的金融事件,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青年出于个人消费等原因,通过不同类型的“校园贷”等电子化借贷途径获得贷款,这种贷款审核简单快速但往往有超出合理范围的年化利率,成为事实上的高利贷,导致借贷青年无力偿还,最终给借贷者带来巨大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陈啸,2016)。“裸条”贷款导致女大学生自杀属此类代表性事件。第二类事关青年创业。青年由于自身创业主动向金融机构贷款,或被人以合作创业的名义去贷款,遭遇创业失败或创业骗局,从而向金融机构欠下高额贷款。第三类是青年的资金安全需求。青年人由于刚刚成为独立的经济个体,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经验,容易遭遇不同类型的金融诈骗从而陷入金融风险,山东某高校大学生徐某报到期间受到短信金融诈骗^①即属此类。

面对这些以青年为受害主体的金融事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借贷平台进行监管。2017年9月6日,教育部发言人再次申明任何网贷机构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2017年初,教育部和银监会、人力资源部联合印发了规范校园贷款管理的文件,明确取缔校园贷款这个业务,规定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同时,学术界对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金融风险和困境也有丰富研究,这些研究重点讨论了青年遭遇不良金融服务的原因,不良金融服务的危害和解决青年遭遇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等内容。

无论是严厉的政策监管还是丰富的学术研究,从频繁见诸媒体的青年遭遇金融风险的新闻报道来看,类似的金融贷款事件仍旧层出不穷,有关青年群体抗拒金融风险能力建设的研究及可行性对策依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本研究尝试引入金融能力理论来分析我国青年金融事件的特点、成因,并提出在该理论框架下社会工作推进青年金融能力建设的相关对策。

二、当前青年金融风险的研究难点

当前相关研究把大学生接受不良金融服务、遭遇金融风险的原因分为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

* 本研究得到社会科学重大基金“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建设”滚动项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级项目“大学生金融能力和金融风险研究:金融社会工作视角”(666050110)的支持。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文责自负。

^① 《新华社每日电讯》2016,《大学生成电信诈骗受害“重灾区”》,8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6-08/27/c_135637921.htm)。

外因包括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互联网金融更为便捷(穆颖超 2017)、部分网络金融机构引诱大学生过度消费(陶杨、刘顺 2017)以及政策监管不力(包艳龙 2016)三方面。内因则包括消费心理和金融知识两个方面。青年人的消费心理不成熟,存在虚荣攀比心理、超前消费等问题(张伟、赵丹洋, 2017)。同时,青年人有关金融知识的能力不足(桂丽思等 2017)、缺乏足够还款和风控能力(安翔、杨会科 2017)导致青年遭遇金融风险。

青年遭遇金融风险的危害包括对青年经济状况的影响、对青年健康发展的影响和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影响。经济方面,现有研究认为,金融风险主要是侵犯了青年的合法经济权益,巨额债务还会给青年及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岳娜 2017)。校园贷等不良金融服务不仅影响青年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还影响青年成长和家庭关系,包括影响生活质量,影响大学生学习(张伟、赵丹洋, 2017),甚至可能逼迫青年学生走向极端,引发高校学生犯罪、自杀和心理疾病(袁丽峰、勾志文, 2016)。不良金融服务会影响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家庭和睦(陶杨、刘顺 2017)。此外,不良金融服务还对社会环境有恶劣影响,会破坏校园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影响学校安全稳定(安翔、杨会科 2017),进而对社会治安产生风险(王久才、田金花 2015)。

现有研究也提出了一些对策,包括加大对金融服务企业的监管力度,净化金融环境等(张伟、赵丹洋 2017),建议完善校规校纪(安翔、杨会科 2017),加强对学生的管理(王久才、田金花 2015)。也有研究提出针对大学生开展干预,包括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念,树立良好消费行为(穆颖超, 2017),规范学生借贷行为(安翔、杨会科 2017)等。还有研究提出增强青年的金融有关知识和能力,普及借贷有关法律知识和信贷有关知识(桂丽思等 2017),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加强监管家庭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理财习惯(王久才、田金花 2015),加强对困难学生资金扶持力度等(安翔、杨会科 2017),还有学者提出应该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从不同层次提供干预(袁丽峰、勾志文 2016)。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从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的角度,侧面讨论了青年陷入金融风险中的原因,认为我国青年金融知识、金融技能较弱,因而容易陷入金融陷阱(唐怡铮、陈杨旻 2015; 马婧 2017)。

以上研究提供了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遭受不良金融服务的原因、危害和对策的多种分析思路,为理解和改善这一现象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分析和对策讨论既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也缺乏系统的实证资料分析。此外,从金融学与社会工作相结合的角度,以青年人群为风险主体,对其金融增权以及社会工作可介入途径的分析讨论尚未成体系。

三、金融的本质、金融能力理论与金融风险

金融的本质是实现不同人之间的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价值交换(陈志武 2017)。能够实现跨时空交易是金融产品得以普遍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产品有很多种,对青年人群而言,借贷(比如“校园贷”)是其接触最多的金融产品,但不管是通过传统方式还是互联网方式来实现,其金融交易的本质都不会改变,仍然是交易各方的跨期价值交易。即,贷方(或资本方)将货币提供给有需要的青年人并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以此来实现货币的增值,同时青年人通过借取货币并承诺在约定时间内偿还本息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货币需求。

这种跨期价值交换,最基本的功能是解决了青年人群短缺货币的困境,他们通过支付利息的方式置换了获取货币的“未来时间”,具有积极的市场意义。但无论何种金融产品,资本方出让资本的使用权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盈利,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特点,这意味着金融产品提供方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最大化借贷产品的利息。一般来说,利息的比例和偿还方式,是各类借贷产品成为金融风险的两大要素。因此,利息比例越高、偿还的期限和方式越严苛,则意味着金融产品潜在的风险越大。当需要偿还的利息额度在规定期限范围内通过约定的归还方式难以实现时,金融风险则成为事实,并对借款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目前,我国青年人群遭遇金融风险最普遍且造成后果较严重的金融产品首属校园贷。这类金融产品绝大多数属于民间借贷,作为“草根金融”游离于国家融资体系之外,在当前相关立法不健全、有效

监管缺位和金融体系不完备的背景下,它不仅仅存在变相(或欺诈性)的高利息、期限短以及还款方式苛刻的潜在风险,还因为其系统性、传染性、交叉型、集中性、隐蔽性等特点更增加了借款人的金融风险,并且在借款人难以偿还贷款时引发性质特别恶劣的人身及家庭伤害。在金融产品盛行的现代社会,这些知识已成为评估金融风险的基本常识之一,但专业领域的常识并不等同于日常生活的常识,尤其对于从未真正走入社会的在校青年学生或者刚刚走入社会的青年人群而言,金融领域的专业常识并非自然天成,需要更多的社会政策支持和社会干预去帮助其养成相对应的金融知识进而形成相应的金融能力。

金融能力理论为理解和应对这种现象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框架。金融能力理论的研究发端于资产建设理论。资产建设指通过个人努力、社会和政府支持来帮助个体和家庭积累可以用来支持个体长期发展的经济财富。该理论专注于在生命周期中通过经济资产的积累来塑造和转换成不同形态的资本(比如,高等教育、个人创业、房产、退休基金)。资产对家庭有丰富的影响,包括提升对未来的正面期望,发展其它形态的资本,增加抵抗风险的能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增加个人生活效率,增加社会影响(公民社会的参与者),增加政治参与,增加下一代的福利等方面(Sherraden & Gilbert, 1991)。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学术界开始尝试与全球(包括美国、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的政策制定者合作,推广为穷人制定资产建设的政策,例如开设儿童个人发展账户,在中国内地也有学者开展小规模尝试(邓锁等, 2014)。

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资产建设概念被扩展为具有更大范畴的金融能力概念。针对弱势群体面对复杂金融决定的金融失能(financial disfunctioning,例如没有银行账号,不得不借高利贷等)问题,一些研究者(Sherraden, 2013: 3-43)在森(Nussbaum & Sen, 1993: 30-53)对能力(Capability, 又译作可行能力)的定义基础上提出了金融能力理论。金融能力是指现代社会中个体具有基本的管理金融和经济资源的知识与技能,并通过社会提供的合适的金融服务使用这些知识和技能,从而达到保证个体经济安全,实现个体经济福利的目的。外在的机会和服务是个体真正实现金融能力的基础,因此,金融能力是个体的内在金融能力(internal capability)与外在金融机会(external capability)的综合。前者是指个体内在的经济金融知识、能力和技巧(financial knowledge/financial literacy),后者是指外在的能够接受合适金融服务的机会(financial inclusion)。只有二者结合,个体才具有金融能力,才能实现经济金融安全。而且个人的金融素养和外在的金融服务机会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个人金融素养的高低,影响了个体可得的金融服务机会的多寡;而个体有没有充分的机会接触金融服务,又限制了个体金融素养的提升。弱势群体往往是既缺乏个体内在的经济金融知识,又被排除在合适的和主流的金融服务之外。也因此,2015年,由玛格丽特·谢若登(Margaret Sherraden)提出的提高社会弱势群体金融能力的建议被美国社会工作学部委员会列为未来美国社会和社会工作专业面临的12大挑战之一(常莉等, 2018)。

传统的观点认为,个体的金融知识与技能和他们可以接受到的金融服务分别属于个人行为和商业服务的范畴,不属于社会公共服务干预的内容。与之相反,新的金融能力理论认为这恰恰是社会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切入的一个重要领域。有了金融能力,穷人可以为达到自己的最佳金融利益而正确地理解、评估和行动。金融能力使得个体提升自身有关金融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又能获取金融方面的机遇,从而能够提升个人的金融功能,进而提升他们的金融福祉和生活机遇(Sherraden, 2013)。这一概念在研究、教育、政策以及社会服务方面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服务领域涉及低收入移民家庭等弱势群体(Zhan et al., 2013: 156-173)。对不同群体的服务和研究发现,一方面弱势群体普遍存在金融能力程度较低的状况;另一方面,通过适当的社会干预,弱势群体的金融能力可以得到提高。在日益金融化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金融能力是帮助贫困青年和其他贫困群体脱离贫困、降低金融风险、获取金融机会的一个重要渠道。

如上所述,金融能力的概念包括个体的金融知识与技能和合适的金融服务,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改善金融能力,社会政策可针对这两个要件分别进行改善或同时进行改善。

一是为了改善个体金融知识与技能,最常用的社会服务包括理财教育(financial education)、理财咨询(financial counseling)和理财指导(financial coaching)。例如,发达国家的中学教育中都包含

了理财教育的课程。许多社会工作的服务机构也专门针对弱势群体开展各种各样的理财教育,比如指导低收入群体如何申请税收利益或者被虐待的妇女如何实现财务独立等等。

二是通过社会政策(以及市场)干预,为最广大的人群提供普惠性的金融服务,同时监管金融产品、规范金融市场。为了保证这些政策能帮助到穷人等弱势群体,社会政策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要强调四个原则:普遍性——所有个体都应被包括在这些推进金融能力(比如,资产建设)的社会政策范围之内,如此一来,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民间借贷的负面效应;进步性——推进金融能力的社会政策应该对弱势群体提供额外的帮助,以弥补弱势群体在金融市场的相对劣势;长期性——金融能力(比如资产的积累)受到时间的长期影响,越早开始越好,尽早形成资产建设能力和对金融风险的评判能力;发展性——对弱势者的金融能力建设不是用来满足日常消费的需求,必须和收入创造能力相关,金融能力提升所需要的金融服务也应该回应这些发展性需求(Sherraden & Gilbert, 1991: 148)。相关的政策实验在拉美、非洲、东亚等地推广,包括我国的台湾和香港(Chan et al., 2013)。

金融能力除了有助改善经济状况,还影响个人健康发展,包括幸福感、效能感、满意度和精神健康。昆兹(Kunz, 2016)等人的研究发现,金融能力对研究对象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学者在英国的大规模研究(Taylor et al., 2011)中发现,金融能力的提高将降低精神疾病指数(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得分,提升生活满意度,减少受人们焦虑影响的概率。

现有文献对青年遭遇金融风险的原因和对策的分析,或多或少和金融能力理论的内涵一致,一方面因为青年自身金融素养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市场上正规的金融服务不足,而边缘性的金融服务缺乏规范。部分文献还注意到了从个人和环境双重因素分析原因。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尚未纳入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中,金融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合这些研究的机会。我们把现有文献的分析讨论纳入这一框架讨论。详情见表1。

表1 现有文献和金融能力理论的关联

归类	原因	对策
个人金融素养 金融服务机会	虚荣攀比心理(陶杨、刘顺 2017)、超前消费(张伟、赵丹洋 2017; 包艳龙 2016)	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消费挂念(陶杨、刘顺 2017)
	青年人有关金融知识的能力不足(桂丽思等 2017)	树立良好消费行为(穆颖超 2017), 规范学生借贷行为(安翔、杨会科 2017)等。普及借贷有关法律知识、信贷有关知识(桂丽思等 2017)
	缺乏足够还款和风控能力(安翔、杨会科 2017)	加强监管家庭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理财习惯(王久才、田金花 2015)
	互联网金融更为便捷(陶杨、刘顺 2017; 穆颖超 2017; 张伟、赵丹洋 2017)	加大对金融服务企业的监管力度,净化环境等(张伟、赵丹洋 2017; 王久才、田金花 2015)
	网络金融机构引诱过度消费(陶杨、刘顺, 2017; 包艳龙 2016)	完善校规校纪(安翔、杨会科 2017)
	监管不力的问题(包艳龙 2016)	加强对困难学生资金扶持力度等(安翔、杨会科 2017)

国际上最新的社会政策发展整合了上述两方面的服务,在给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提供教育和培训服务来改善个体的金融知识与技能。因而,采用金融能力和资产建设这一理论对青年的金融风险进行分析,可以统一青年遭遇金融风险的内在和外因素,比较整合地分析问题,进而提出系统的干预策略。

四、研究方法

(一) 案例研究与非介入研究

为了分析青年遭遇金融风险的原因,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multiple-case study)的方法开展研

究。案例研究有不同的定义,普遍认为案例研究是对现实情景中的一种暂时现象进行深入调查的研究(殷 2017)。美国心理学协会认为案例研究是获取案例资料,描述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提出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或临床应用,或者理论发展的研究方法(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0: 11)。究其共性,案例分析的优势在于通过对现实情境中真实发生的案例的多种信息进行整体的、深入的分析,以期获取对案例的理解,讨论解决案例所反映问题的方法并提出建议。本研究采用多案例的方式,指的是对多个案例进行调查分析的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其结论更有说服力(殷 2017),通过对多个青年遭遇不良金融服务的案例进行分析,试图获取展示青年遭遇的金融风险状况和青年遭遇金融风险的原因。

此外,本研究主要通过非介入研究(巴比 2005: 306)的方法获取研究资料。出于保护金融风险受害者的考虑,经历过金融风险的青年人有着创伤经历,对他们的访谈具有较大的二次伤害风险,因而出于研究伦理的考虑,本研究选择不会影响当事人的非介入方法开展研究,采用的案例均来自媒体报道。

(二) 案例的搜集与选取

本研究是由受过训练的研究生在各大新闻媒体搜索与青年遭遇不良金融服务有关的新闻,并在新浪微博和今日头条等自媒体平台接受新闻推荐。搜索时间为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共获取43个案例,原始信息时间跨度为2012年12月到2018年3月,来源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央视财经等国家级媒体,还包括通过今日头条、微博等社交媒体推送的自媒体新闻。这些媒体具有相对严格的报道审核机制,并以客观、公正为报道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被选取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本研究通过网络获取43个案例的详细报道资料,对获取的新闻进行简单的编码整理,然后对搜索到的新闻根据其提供信息的丰富性进行目的抽样,具体抽样标准按照两个原则,其一为最大差异抽样(王宁 2002),选择能够体现青年遭遇金融风险的重要特征的案例;其二为关键抽样,选取特色鲜明,允许进行最大限度理论分析,可以将其信息运用到其他案例的案例(Creswell, 2007: 120)。在此两大原则的约束下,最终得到四个案例。

(三) 案例资料简介与分析

本研究选取的四个案例在媒体进行报道时已经对相关人士的姓名做了化名处理。本文对其资料进行摘录整理(见表2),详情见脚注相应链接。

表2 典型案例资料汇总表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主题	大一学生校园借贷晚还6天1万变4万,吞药欲自杀 ^①	95后陷校园贷欲轻生,父还16万债款:就当花钱办葬礼 ^②	“现金贷”吞钱又吞命,务工女青年夏双陷入高利贷欺诈困境 ^③	大学生小周“裸条”5000元滚成26万元,裸照被发亲友 ^④

① 2016,《大一学生校园借贷晚还6天1万变4万吞药欲自杀》,10月18日(<http://edu.qq.com/a/20161018/002869.htm>)。

② 黄昂瑾 2017,《95后陷校园贷欲轻生,父亲还清16万债款:就当花钱办葬礼》,11月30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86412)。

③ 史额黎 2018,《“现金贷”吞钱又吞命》,1月17日(http://zqb.cyol.com/html/2018-01/17/nw.D110000zqgnb_20180117_2-10.htm)。

④ 周丹 2017,《武汉女大学生裸贷5000元滚成26万元,裸照被发到父亲手机上……》,4月10日(<http://www.ctdsb.net/html/2017/0410/hubei89132.html>)。

续表 2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身份背景	小郑,某高校大一新生,来自单亲家庭,其父只给生活费,对他没有其他管束	林阳,在校生。其家庭有一定经济实力	夏双,出身于某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家庭会满足其手机、电脑等消费要求	小周,20岁,是大二学生。家有父母和年幼的弟弟,父母月收入共6000多元
借贷原因	其堂妹信用卡有8000元债务无力偿还,小郑9月借贷为堂妹偿还信用卡债务	借贷为自己还钱和消费。申请贷款5000元用于偿还朋友,其余用来消费	向朋友借款,未能及时还款,该朋友介绍的多家借贷公司,借贷还债	因买东西缺钱,导致借贷消费。但是想不起钱具体花在了哪里
借贷过程	在学校厕所里看到了不用利息的借贷广告,找两个朋友做担保人去借钱,借款金额10000元,签了一张1.5万块的欠条,以为多出的五千块钱就是利息。该借款名义免息,但实际8日利息约折合5000元,每日利息为6.25%,年利率折合2280%	主动申请贷款5000元。被迫贷款。中介主动打电话推荐各类新的贷款平台、高利贷。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付出极高的利息和中介费。但为了还清贷款,不得不接受	该朋友介绍的现金贷具有斩头息(预先在本金中扣不菲利息)、高介绍费、高利率等特点,一笔借款1.5万元,每周的还款额为1850元。周息高达12.3%,年利率达到640%。后期陷入恶性循环。而根据乡邻分析,介绍借贷公司的朋友可能是故意设局欺诈夏双	在学校公厕门上看到借贷小广告,对方要求手拿借条,拍摄裸体照片和视频“裸条”),以保证按时还钱。第一笔借款5000元,拿到手只有2750元。贷款需在一周内还清,周利息约5.7%,年利息约298%。第二阶段,无力偿还债务,不敢求助家人,业务员找别的借贷平台借钱还债。半年以来从30多家公司借贷,拿到手的本金共8万多元,她总共要还近26万
借贷危害	因故逾期六日后,被该公司扣留并殴打。要求每日支付4500违约金,共计4.2万,不允许离开。小郑在其女友被迫做担保人以后,才得以脱身。小郑无处筹钱,走投无路决定自杀,并通知记者,希望警醒世人	后期每天需还款一万多元,林阳终日心不在焉,不修边幅,几近崩溃。历经两个月的煎熬,决定改变决定彻底还清高利贷,整理账目,发现欠款太多,感到绝望,尝试跳楼	其母亲四处借钱还债,最终母亲不堪忍受催收人员的威胁而自杀。现在夏双被送到外省亲戚家	她最终无力还债,裸照被发给亲友。小周暂时不愿意上学,离开了湖北,到上海一起打工
家庭及社会反应		其父亲对其极其不满,虽然替其还债,但表示就当花钱为其办葬礼	催收人员并不了解债务具体情况。家长并不知道部分贷款是非法高利贷。警方也认为应该欠债还钱。家长后悔的夏双第一次借钱时没有向父亲坦白,否则会帮其还债	父亲帮她偿还部分债务,但是无力还债,裸照被发给亲友。学校对其进行了心理辅导。由于无法忍受耻辱,小周和父亲一起到上海一起打工

本研究分析单位为案例,即被媒体报道的每一件真实发生的青年遭遇不良金融服务事件。本研究首先对案例进行描述,呈现青年遭遇不良金融服务的状况;其次对单个案例提炼主题,并进而对跨案例的主题进行分析,对案例的结论及意义进行阐释,然后尝试给出解释。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为何频繁发生青年遭遇不良金融服务的事件?如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五、研究发现

本研究从案例基本信息、金融风险信息、遭遇金融风险带来的危害等维度来分析案例。其中,案例基本信息包括时间、地点,受害人的身份等;金融风险信息包括金融风险的形式、初次借贷的主要用途、初始金额和最后金额等;危害包括经济、健康、声誉、家庭和同学成员以及其他危害。本部分剖析案例中所反映出来的青年人遭遇金融风险的特征、青年人遭遇金融风险的原因,进而探讨解决频繁发生青年遭遇金融问题的策略。

(一) 家庭经济处于中下水平的青年更可能遭遇金融风险,危害严重且广泛

遭遇金融风险的青年并无特定类型的身份,但多数人的家庭经济处于中下水平。他们既有来自城市家庭,也有来自农村家庭,有家境比较普通的家庭,也有家境较差的家庭,在遭遇金融风险的时候,既有在校大学生,又有处于不稳定就业状态的务工青年。小郑来自单亲家庭,父亲只是提供生活费而平时较少联系,林阳家境尚可,夏双则来自贫困家庭,小周的父母月收入六千元。四个案例的家庭背景各不相同,但家庭经济均处于相对中下的水平,整个家庭成员的金融能力都不高,家庭遭遇金融风险后的修复力明显不足,能够给青年提供的金融支持极为有限。

案例一中的小郑,自己被殴打,被限制人身自由,最后走投无路,尝试自杀;因为让两位大学生朋友做担保人,同学也被其连累,遭殴打并限制人身自由,以及遭受金钱损失;其女朋友也被限制人身自由,并被迫签订担保协议。除了经济损失之外,金融风险还危害其人身健康、社会网络甚至生命安全。案例二中的林阳,除了经济损失意外,还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修边幅,几近崩溃,历经两个月煎熬”影响了精神健康,进而尝试跳楼,侥幸中止,这一事件还严重影响了他的父子关系。夏双除了经济损失以外,危及自身家庭,给家庭带来负债,失去亲人,其母亲不堪压力自杀,此外追债人多次到夏双所在村庄骚扰,影响了她的家庭声望。小周则是追债人向其亲人、同学发送裸照,严重影响其声誉,只能辍学并接受心理辅导。综上,青年遭遇金融风险,除了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意外,还影响其学业、自身与家人的精神健康以及社会网络,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

(二) 青年遭遇金融风险,往往存在一个由可控风险转化为不可逆的金融漩涡的转化阶段

案例二中的林阳,借贷5000原用于还债和消费,在无力还款的时候,选择继续借贷用以还款,而这一过程还受到上述中介借贷平台和高利贷两种方式的推动,导致最后陷入贷新贷款还旧贷款的恶性循环;案例三的夏双则是借朋友的钱未能及时还款,经由该债主推荐多家借贷公司,陷入恶性循环;小周的裸条贷款初次借贷只有5000元,然而在业务员“介绍”下,开始找所谓借贷平台借钱还债。可见,青年遇到第一次贷款的时候,如果当事青年能够通过更为合理的方式得到支持和解决;避免借新债还旧债,是可以走出困境的,否则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将越来越大。这个转化阶段成为青年金融风险情况恶化的关键节点。这个转化阶段,可以看作是金融能力对青年金融安全的二次影响。首次影响是青年由于金融能力不足,缺少金融素养和金融服务机会,因而陷入金融风险;继而金融风险是否急剧增大还受到外在金融环境的影响,如家庭的抗风险力、金融监管政策的力度、社会风险支持等等。

(三) 社会金融化已经形成,并且和数字化互相促进,加剧了青年的金融风险

我国社会逐渐金融化,青年遭遇金融风险和这一宏观社会背景有关。以往只有富裕阶层涉及

的金融日益进入普通人生活,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成为普通人必不可少的金融服务,余额宝、蚂蚁花呗等小额金融产品的可获得门槛大大降低。这种经济高度金融化、日常化的状况被称为社会的金融化。目前,青年要获得传统大型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仍存在门槛,但社会的金融化为他们提供了较多机会去获得日常式、微小式的金融服务,解决了青年货币短缺的困境。然而,逐步金融化的社会在为青年人提供相对正规的小规模金融产品时,也为不规范的金融服务提供了生长空间。许多民间资本看到了青年的货币需求这一潜在市场而特制出各种不规范的金融服务产品。这些金融产品以低门槛的可获得性掩盖了其高利息、高风险为主的风险因素。从不同案例可以发现,青年群体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到非正规金融服务,比如无处不在的手机应用广告、校园内的海报、朋友的介绍等便捷、无门槛且专门“诱惑”青年群体的微渠道。案例一中的小郑和案例四中的小周都是在学校厕所看到了借贷广告,案例二林阳也是通过校内海报广告获知借贷信息。这三个案例说明,高风险的非正规金融服务在高校已经处于泛滥的状态。这些不良金融产品导致青年群体面临较高的金融风险。

社会金融化和社会数字化叠加,加速了金融化的进程,给缺乏金融能力的年轻人带来更大的风险。案例分析显示,社会的数字化也加剧了非正规金融产品进入青年群体的可能性。案例中的小周首次贷款咨询是通过微信和对方取得联系,作为抵押物的“裸条”也是通过数字手段发送。在后续大肆借贷的阶段,更是通过专门的即时通讯工具,QQ的群功能,使该青年在半年时间里从30多家借贷平台借钱。这些借贷平台通过互联网来高效锁定自己的目标客户。林阳也是接到中介主动打来的电话,推荐的平台恰好满足了他的贷款、还款需求,此后他越来越频繁地转换新的借贷平台。此外,在开始接触借贷之后,各种专门针对青年群体的灰色甚至非法中介人员,会在青年人群理财能力低下、金融风险辨别能力薄弱的境况下推动青年人进一步借贷。首次借贷之后,青年常会遇到中介服务的积极促销,如案例二中的林阳遇到中介介绍其他贷款平台以及推荐高利贷两种形式的推动;案例三中的夏双则直接由债主朋友推荐借贷公司;案例四中的小周经由业务员介绍,加入专门的借贷QQ群。这些“积极促销”往往通过互联网等数字化手段得以快速实现。网络化借贷平台的易得性,激化了林阳陷入贷款的困境,中介主动电话推荐平台则表明了,在数字化时代,脆弱的网络安全泄露青年金融信息的可能性。这与现有文献中提出的互联网导致互联网金融更便捷(陶杨、刘顺,2017;穆颖超,2017;张伟、赵丹洋,2017)的分析相印证。数字化手段把青年群体封闭在非正规金融产品的孤岛里,数字化的虚拟网络减低了青年人群与外界现实世界的接触,进而降低了外在社会支持网络阻断青年陷入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四) 青年乃至全社会都对社会的金融化应对不足,导致青年金融能力不高

本研究发现,就青年的金融能力来说,既缺乏个人的金融素养,也缺乏恰当的金融服务,当前社会缺乏对非正规金融产品的系统性监管。

案例中青年表现出在金融有关知识、意识和行为习惯等方面都欠缺准备。一是缺乏风险意识。林阳在第一贷款较为顺利后,马上降低了对还贷压力的警惕,他说“第一次比较战战兢兢,第二次的心态变成了‘管他呢,做就做吧’”;而小周裸条的抵押形式表明其风险意识较低。二是缺乏消费管理有关知识和习惯,例如预算和记账的习惯,对自己的债务状况没有清晰的认识。林阳“掏出所有平台一个个算,包括欠朋友、同学和高利贷的钱。我算了两个多小时都没算完”,可见还未建立记账的金融习惯。小周也表现出典型的缺乏预算和记账的能力,她的第一笔贷款用来消费,但是事后她“只记得,每个月生活费1000元,时常感觉不够花,借来的钱,也拿去消费了,但具体买了什么,记不起来。”三是缺乏相应的金融知识。林阳后来还接受了明显违法的高利贷,然而他对监管部门关于高利贷的相关规定毫无概念。^①“一开始我不愿接受,后来实在还不上钱,也就接受了。当时想着

^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还有一个星期来解决,实在不行再向朋友借”。而夏双也是受困于非法高利贷,她曾向一家名为“嘉翔”的公司借款 1.5 万元,每周的还款额为 1850 元。周息高达 12.3%,年利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640%。夏双不知道自己借的是“高利贷”,她只好一家家地借下去,用“新贷还旧账”。

青年缺乏所需要的金融机会,获取金融支持不足。研究发现,青年不仅个体层面的金融素养不高,中宏观层面的金融机会也很缺乏。分析四个案例的首次借款原因发现,青年对金融服务有较大需求。林阳借款 5000 元,用于归还朋友的钱,并用于生活消费。夏双因向一个女性朋友借了 1.2 万元,没能及时还款,对方介绍其联系借款平台。小周想买些东西,正好缺钱,向借款平台借款 5000 元;小郑帮助妹妹归还 8000 元信用卡欠款。以上四个案例中,除了小周是为了自身消费而开始借贷以外,其他三位都有较为正当的借款理由,但是他们并未接受到针对他们的小额贷款服务,而处于灰色地带的所谓借款平台则似乎无处不在,成为弥补他们较高的金融服务需求和有限的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之间的缺口的选择。

此外,青年的家庭及其社会网络对社会的金融化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未能为青年应对金融社会化提供足够的支持。小郑出身于单亲家庭,“其父平时只提供生活费,不怎么管他”,这表明他难以从自己的家庭获得足够的经济支持,提升自己的金融知识和能力,而他陷入金融风险的原因是希望给自己的堂妹偿还 8000 元的信用卡债务。这一方面说明他对自己的偿债能力估计过高,另一方面,则表明他的堂妹和他一样,金融能力不足,滥用信用卡到了难以偿还的地步。类似的,夏双出身于经济困难的农村家庭,但是其购买手机和电脑的要求会被父亲满足。这些均表明青年人的原生家庭未能培养青年人量入为出的合理消费习惯。

青年的外在社会网络也欠缺基本的金融知识,难以提供足够的金融机会和应对支持。夏双的父亲也不知道贷款的性质为非法的高利贷,甚至当地警方也表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地派出所还为其还款提供见证。这表明不仅其家庭金融知识不足,未能对青年提供足够的支持,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未对社会的金融化做好准备,未能储备足够的金融知识和监管意识。

(五) 小结

青年遭遇金融风险,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开始金融化与数字化叠加的背景下,青年金融服务需求迅猛提高,自身金融素养不足,而传统金融机构乃至全社会都尚未做好准备的必然结果。

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时空背景,把青年的金融风险理论形成示意图如下。横轴为时间,纵轴为需求、供给的数量,也可以理解为各类金融服务的可得性。D 代表青年的金融服务需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金融只和少数人有关,青年金融服务需求水平不高,增速缓慢。随着社会日益金融化,青年金融服务需求迅猛提升。D1 代表青年在自身金融素养不高的情况下,存在非理性的金融服务需求,因而其曲线偏高,D2 则代表在青年具备较高的金融素养的情况下,其金融服务需求将更为合理。S1 代表正规金融服务的供给,增速平缓,S2 代表非正规金融服务供给,在时间点 T1 之前,其存在较少,故而在原点 O 到 T1 的时段内,并无非传统金融服务供给曲线存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的数字化和金融化导致青年的金融服务需求曲线迅猛提升,传统金融服务供给虽然有很大提高,但是已无法满足广泛的青年的金融服务需要,而非传统金融服务(包括边缘性质乃至非法的金融服务)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在 T1 点到 T2 的阶段,D 大于 S1,正规金融服务的供给小于青年的金融服务需求,意味着青年的金融服务需求得不到正规金融服务的满足,需要扩展普惠金融,加大青年的经济参与,其间的供给缺口可以用面积 A 来代表。而在这个时段,伴随着社会的数字化,非正规金融服务的供给 S2 大于青年的金融服务需求 D,服务提供商(或民间资本方)将加大对青年的吸引和渗透,加剧青年的金融风险。可用面积 B 来代表青年的金融风险。

此外,影响青年金融需求曲线形态的重要因素是青年的金融素养,包括青年关于金融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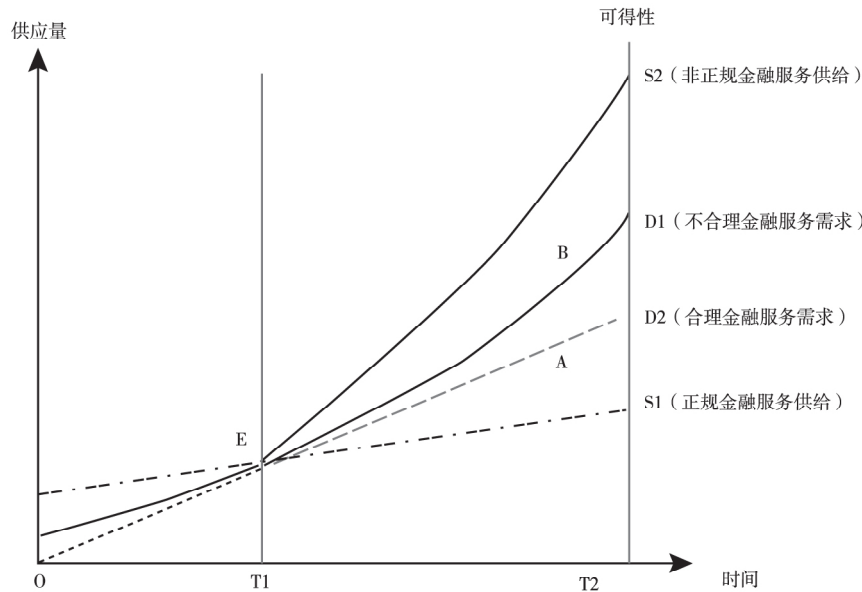


图1 青年金融风险理论示意图

态度和行为习惯。如果青年的金融素养较高，则其金融服务需求相对较为合理，其金融服务需求曲线为D1；如果金融素养低，则会有虚高的金融服务需求曲线D2。由于长期不重视对儿童、青少年的经济社会化，青年普遍金融素养较低。金融素养的高低将影响其金融服务的数量、类型等变量，从而影响其金融服务需求曲线的形态，进而影响全社会的普惠金融的需求，以及青年面临的金融风险。

因此，解决青年频繁遭遇金融风险的策略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提升青年的金融素养，促使青年的金融需求趋于合理，从D1转为D2；另一方面，提升面对青年的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使得S1曲线贴近D2曲线。金融素养的提升和金融机会的提高的结合，即提升青年的金融能力。

六、讨论与社工干预建议

（一）讨论

青年遭遇不良金融服务，频繁陷入困境，根本原因是我国社会在社会数字化、信息化的助力下，正在日益金融化，不仅青年未能较好地完成经济社会化以应对社会金融化，其他相关各方也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相比社会金融化已有长期历程的西方国家来说，我国社会的金融化来势更为猛烈，对全社会都带来挑战，金融素养、金融服务都不足的人群更易处于相对弱势。从本文案例来看，青年对这一挑战的应对不足，金融能力欠佳，自身缺乏足够的金融素养，外界也缺乏足够的正规金融服务以及金融支持，需要提供一系列的干预。

作为弱势群体，青年需要不同层面的帮助来应对这一问题。李忠民、刘静（2009）的调查数据表明，在我国居民金融社会化程度普遍较低的情况下，30岁以下年龄组的金融社会化程度比其他组更低。而中学生的经济社会化，基本上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学校教育的影响不明显（陈志霞，2000），来自家庭的金融教育不足，甚至弱于学校和网络等媒体（李媛、郭立宏，2014）。

对中国大学生来说，他们在中学期间并没有得到较好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化，到了大学生活，他们第一次开始有了一笔可以支配的现金，独立从事消费、储蓄乃至投资等不同的金融行为。在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大学生要应对复杂问题，无疑面临较高的风险。对于刚走出大学的青年来说也是如此，虽然有研究表明，大学生金融教育对金钱态度的改善以及金融素养的提高有着重要的

影响(阮瑞草等 2015),但是大学并未对其进行适应经济社会的教育和训练,一旦毕业,从校园走进社会,将面临较校园经济生活更为复杂的金融环境。

本研究案例基本涉及了青年的借贷需求以及所涉及的金融风险。扩展开来,青年的金融服务需求不限于借贷需求,还会涉及获得收入、资产累计、消费管理、投资理财和保险、保持信用及保障等金融需求。处于贫困状态的大学生和青年,需要提供提升就业能力以及从各类社会救助渠道获取收入的帮助;投身创业的青年需要一笔资产作为自己创业的初始资金,由于缺乏资产累计的意识,青年将很难在需要的时候积累到足够的资产;所有的青年都需要消费管理,他们需要知道如何制定预算,记账,理性消费;青年还有保持自己信用的需要,社会的金融化,使得个人信用成为享受各种其他金融服务的核心基础,然而青年群体一方面因为金融素养不足,缺乏维系乃至提升自己信用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又因为传统金融系统对青年群体信用评估正式不足,进而影响青年享受其他正规金融服务;青年有保障性的需要,购买各类保险,控制自己金融风险的需要,购买保险的需求不再限于高净值资产的人群,普通青年也有此类需求,而此类金融服务同样存在正规金融服务机会不足,非正规金融服务监管不力的问题。以上各方面的需求,都同时存在青年个人能力不足,正规金融服务提供不足的问题,这无疑将影响青年的金融福祉。

(二) 金融社会工作干预

综上,在社会金融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上就处于经济弱势的青年,由于个人金融素养的不足和正规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导致青年在金融福祉领域的脆弱性被进一步加强。方兴未艾的金融社会工作为应对这一社会问题的不同层次的干预提供了参考框架。金融社会工作是通过促进个人和家庭的金融能力来提升金融福祉,最终提升其生命品质的实践领域(Sherraden 2017)。本研究结合金融社会工作,特别是新发展的金融能力有关理论,并参考国际上的相关实践,为预防青年金融风险,提升青年金融能力,进而促进青年健康发展,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金融素养和金融机会两个要素,青年的收入、资产、消费、信用及保障五个领域开展干预,^①图2为金融社会工作干预内容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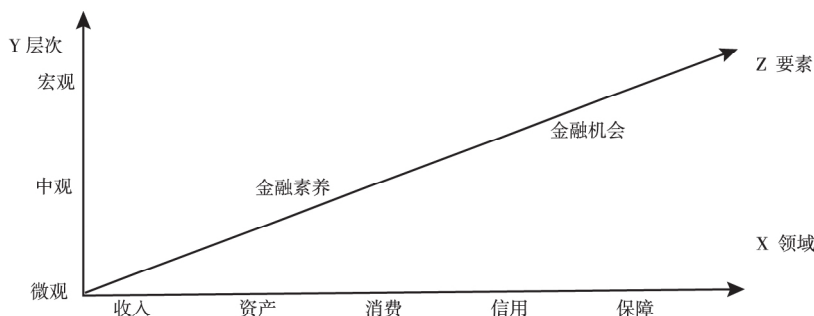


图2 金融社会工作矩阵示意图

宏观层面,在社会政策层面建立金融能力和资产建设导向的社会政策,鼓励青年尽早开展资产的积累。在全国层面,可以加大普惠金融,尤其对青年友善的金融服务;加强对金融机构,尤其互联网金融服务机构的监管,并加强对全体消费者的金融知识培育;加强执法部门对处理民间金融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培养;加快为青年提供相对全面和系统的金融支持体系。

中观层面,加大中小学和大学对在校学生的金融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通过积极的金融社会化应对社会的金融化。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21个国家和地区对青少年开展了系统的有针对性的金融教育(陈耕等 2016)。我国应该针对对个人金融生活有关的获取收入、积累资产、

^① 本文暂时考虑三个维度,还可以有其他维度,例如补救型与发展型干预的维度。

消费管理、信用管理、保障等有关金融知识进行普及教育,提升社会工作等助人专业对弱势人群金融能力提升的敏感性,并鼓励各专业力量投身开展研究、服务和教学。

微观层面,社会工作干预可以包括对普通青年的金融知识的训练和培养;向处于负债状况的青年提供金融咨询、法律咨询和援助;鼓励家庭从小培养孩子的记帐、财务预算、理财等能力,以形成良好的金融意识和金融行为习惯;此外,还应该向处于危机状态的青年提供危机干预等;提高青年面对金融风险的辨识力和抵抗力,养成较为全面的金融能力。

举例说明,可以设计针对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群体的金融能力提升的干预项目。首先,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开发满足大学生需要的金融服务产品。当前银行可以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助学贷款,但是对大学生办理信用卡、消费信贷等日常金融服务需求,并未开发相应的金融服务产品给予满足,因而应该倡导针对大学生的正规金融服务机会。其次,提升大学生金融素养。针对贫困大学生开展提升金融素养的工作坊,提高其有关预算、信用、记帐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其合理消费等恰当的金融行为。再次,鼓励大学生累计资产。通过与银行的合作,鼓励学生养成累计资产的习惯,并切实在四年内,鼓励学生通过目标储蓄,外加奖励性的社会捐助配对储蓄的方式,帮助其累计一定金额的资产。由此,大学生,尤其贫困大学生的个人金融素养得以提升,金融服务机会得以扩展,从而金融能力提升并且积累了一定的资产,在大学期间,可以显著提升其金融福祉,极大降低其陷入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本文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采用金融能力的理论框架对青年陷入金融风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使用社会工作的不同层次方法进行干预。后续还应该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对发展于美国的金融社会工作有关理论和实践进行本土化,发展适合本土的干预方法,并采用实验设计检验干预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 艾尔·巴比 2005,《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安翔、杨会科 2017,《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的高校大学生借贷乱象探析》,《经营管理者》第3期。
- 包艳龙 2016,《“校园网贷”发展情况调查与分析》,《征信》第8期。
- 常莉、周晓春、吴世友 2018,《美国社会工作之“大挑战”:解读与启示》,《社会建设》第3期。
- 陈耕、王丽红、唐怡铮等 2016,《金融素养指数构建与分析——基于福建省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福建金融》第10期。
- 陈啸 2016,《小议“裸条”与民间“高利贷”》,《上海人大月刊》第9期。
- 陈志武 2017,《金融的本质是价值的跨时空交换》,《中国民商》第7期。
- 陈志霞 2000,《城市中学生经济社会化的调查分析》,《青年研究》第5期。
- 邓锁、迈克尔·谢若登、邹莉、王思斌等编 2014,《资产建设:亚洲的策略与创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婧 2015,《青少年金融素养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南京地区中学生的抽样调查数据》,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桂丽思、侯玉菲、谭梅等 2017,《“互联网+”背景下校园网贷生态调查及启示》,《北方经贸》第6期。
- 李媛、郭立宏 2014,《金融教育影响了大学生的金融认知和金融行为吗——来自陕西的经验证据》,《高等财经教育研究》第4期。
- 李忠民、刘静 2009,《城市居民金融社会化水平测度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穆颖超 2017,《大学生网络借贷的风险及防范》,《经营管理者》第18期。
- 阮瑞草、刘丹、李苏南 2015,《大学生金钱态度、金融素养与金融教育研究》,《时代金融》第15期。
- 唐怡铮、陈杨旻 2015,《青少年金融素养提升路径研究》,《福建金融》增刊第2期。
- 陶杨、刘顺 2017,《校园网贷中的问题与对策》,《合作经济与科技》第15期。
- 王久才、田金花 2015,《大学生借贷问题及对策探讨》,《中国商论》第16期。
- 王宁 2002,《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殷·罗伯特·K. 2017,《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周海涛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袁丽峰、勾志文 2016,《高校学生不良网贷风险防范教育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研究》,《现代交际(学术版)》第

17 期。

岳娜 2017,《大学生“校园贷”问题现状及对策探究》,《济宁学院学报》第 4 期。

张伟、赵丹洋 2017,《高职生互联网信贷的分析与引导》,《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 3 期。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0,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han Charles, M. K. Chan, M. K. Lai, C. W. E. Ng & W. S. Y. Lau 2013, “A Review of Features and Outcomes of the Hong Kong Child Development Fund.”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6 (2).

Creswell, J. W. 2017,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Kunz, J. 2016, “Psychosocial Well-being and Financial Capability.” 20th Conference of Society for Social Work and Research, Washington, DC.

Nussbaum, Martha & Amartya Sen (eds.) 1993, *The Quality of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erraden, M. 2013, “Building Blocks of Financial Capability” In Birkenmaier et al. (eds.) ,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Asset Development: Research,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7, “Financial capability.” In C. Franklin (ed.) ,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erraden, M. & N. Gilbert 1991,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M. P. , S. P. Jenkins, A. Sacker 2011,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2(5).

Zhan, M. , S. G. Aderson & J. Scott 2013, “Improving Financial Capacity among Low-Income Immigrants.” In Birkenmaier et al. (eds.) ,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Asset Development: Research,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周晓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邹宇春)
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黄进)
责任编辑: 赵联飞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 this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fallibility space” regarding street corner youth , and conduct the research on their delinquent behavio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 through affecting the street corner youth’s motives for crime and fault , the spatial material elements could affect the occurrence of their delinquent behaviors directly; through affecting the street corner youth’s mental state , the spatial non-material elements could affect the occurrence of their delinquent behaviors indirectl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 we could put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wards crime prevention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 and hence suggest some operationalized governance strategies towards the fallibility space of street corner youth.

Keywords: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Street Corner Youth Fallibility Space Environment Design Crime Prevention

The Youth’s Financial Risk ,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Financi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 *Zhou Xiaochun , Zou Yuchun & Huang Jin(69)*

Abstract: The following phenomena have attracted social concern: the youth encounter entrepreneurial scam ,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encounter the “naked” loans , and the student campus loans have risk , etc. This paper uses case study method regarding multiple cases and analyzes four typical case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financial capability , we try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se phenomena.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under the macro context of social financialization , the financial literacy of youth themselves , their families and the whole society are insufficient. The opportunities for formal financial services are lacking , meanwhile the informal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 rapidly. Hence the young people could suffer from financial risk , which in turn jeopardize their healthy growth. We suggest to carry out the financi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 including publishing social policies in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asset-building , conducting training in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for all people , providing young people trapped in financial risk with financial counseling , legal counseling and other assistance , etc.

Keywords: Financialization Financial Capability Youth Development Financial Social Work

Gender Discourse in Social Memory *Liu Yaqui(82)*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memory of involved female educated youth who married local peasants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tragic marriage stories of related female educated youth narrated by onlooker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women’s liberation discourse is superficially brought about by revolution discourse , but it does not always keep the consistent relationship wit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the traditional gender discourse of rural areas , the women’s liberation discourse has encountered failure , even though there is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as a support in this period. In the retrospective nar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nlooker and involved female educated youth , the women’s liberation discourse , the 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 discourse , the traditional gender discourse and the general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have constituted the mutual restraint relationship. In the marriage stories of female educated youth narrated by onlookers , the traditional gender discourse often have the absolute advantage; while behind which is the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gender discourse. In the similar stories narrated by the involved female educated youth , there are full of compromises and even the warmth of mutual support.

Keywords: Social Memory Gender Discourse Female Educated Youth